

東德共黨及其第十次代表大會

畢英賢

德國社會主義統一黨 (Sozialistische Einheitspartei Deutschlands) (即東德共產黨) 於今年四月十一日至十六日舉行第十次代表大會。從形式上看，東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是一個多黨的國家，除共黨外尚有自由民主黨、基督民主聯盟、民主農民黨及國家民主黨，而且這些黨在人民議院 (Volkskammer) 也佔有一定數量的席位。但是，在實質上，共黨控制一切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活動。共黨的意識形態決定著人人必須遵從的目標與價值。因此，自從東德立國以來，共黨始終是主宰力量，正如東德憲法第一條所規定：「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是工人與農民的社會主義國家，是城市與鄉村勞動階級及其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黨領導下的政治組織」^①。東德共黨容許其他政黨存在，同容許其他人民社團存在一樣，是爲了在西方世界中維持一個民主的形象。

東德存在的三十多年的歷史也就是東德共黨的統治歷史。共黨代表大會是黨的最高機關，按現行黨章規定，五年舉行一次，其主要任務是總結上次大會後各項政策與計劃推行的成敗，策定未來五年的政策方針與社會經濟發展計劃，同時選出新領導。出席這次代表大會者除來自東德各地的二千六百七十八名共黨代表外，尚有來自一百零九個國家的一百二十五個「共產黨、工人及革命民主與社會主義黨或組織」的代表團^②。以下各節將就東德共黨的形成、組織領導，以及在其統治下的政治、經濟等現況與走向，予以析述。

東德共黨的成立與發展

德國共產黨係一九一九年由德國社會民主黨內一些極端分子組成，他們激烈反對當時的威瑪 (Weimar) 體制^③，其領導人

註① 《世界各國憲法大全》(國民大會，民國六十七年)第六冊，第一一〇七頁。

註② 代表團名單見FBIS, East Europe, April 13, 1981, E24.

註③ 一九一九年元月德人首先舉行投票選舉國民大會擬制憲法，大會在威瑪地方召開，成立共和國，故稱威瑪共和國。

爲盧森堡（Rosa Luxemburg）及李柏尼希特（Karl Liebnecht）。一九三三年德國納粹黨執政，共黨被禁，大部份黨員被捕殺，少數領袖逃往巴黎轉至莫斯科，在史達林大整肅時復遭池魚之殃。在倖免者當中，有兩名著名人物，一是貝克（W. Pieck），一是烏布立希特（W. Ulbricht）。他們於一九四五年四月返回德國領導歸國共產黨徒，爲蘇聯軍事管理機構服務，六月正式恢復德國共產黨，成爲德國戰後的第一個政黨。年邁的貝克負責一般政策的制定並代表黨同外界接觸，烏布立希特掌握實權。一九四六年四月，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在「馬克斯主義」的基礎上合併成爲社會主義統一黨（即現在東德共黨的正式名稱），由貝克及格羅泰伏恩（O. Grotewohl）同任主席。起初兩黨成員時有衝突，後來社會民主黨勢力逐漸消失。該黨在成立代表大會上，通過了「社會主義統一黨的原則與目標」綱領文件，表明該黨爲「統一德國」而鬪爭，並確定「建設社會主義是其光明的遠景」^④。在西方佔領區，該黨活動被禁。

一九四九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成立，東德共黨成爲執政黨；次年第三次代表大會通過新黨章，增設總書記職位，由烏布立希特擔任。一九五一年開始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一九五一—一九五五年），強制實行農業集體化，並擴大工業中的社會主義部分，引起人民不滿與仇視政府，終於觸發一九五三年六月的抗暴事件。一九五四年三月底召開第四次代表大會，決定加速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取消黨中央原設立的兩名主席職位，由總書記統一領導，自此烏布立希特獨攬大權。

一九五八年六月第五次代表大會更加鞏固了烏布立希特的領導地位，領導階層中的有力反對者大部份失去權位；大會規定黨的現階段任務是，進一步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與社會主義生產關係^⑤。此時，東德嚴重缺乏生活必需品，黨答應增加日用品的生產；同時擴大推行政治教育以創造懷有社會主義道德的新新人^⑥。這些努力皆告失敗，東德人民大批西逃，迫使東德共黨建造「柏林之牆」（一九六一年）以防止勞動力繼續大量損失。圍牆築成之後，共黨的政策也有明顯的轉折，恐怖時期逐漸消失，對史達林也作出謹慎的批評。生產力增高，人民生活水平獲得改善，因之人民對共黨政權的怨懟相應降低。

東德共黨在一九六三年元月第六次代表大會上宣稱，東德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已獲勝，社會主義基礎已建成，同時通過擴大建設社會主義綱領。當年，東德推行「新經濟體系」，試圖把現代化工業方法以及一定程度的自我調節與中央計劃經濟相結合^⑦。經濟改革以及若干政治改革使東德經濟於六十年代中快速成長。一九六七年東德的工業生產已躍升世界第八位，在東歐集團中僅

註④ 〔蘇聯大百科全書〕（第四版），見「德國社會主義統一黨」條。

註⑤ 同註④。

註⑥ 烏布立希特，「社會主義道德十誡」，原載鄧伯克（John Dornberg）著〔另一個德國〕（Garden City: Doubleday, 1968），第十六〇—十七三頁。

註⑦ 戴恩（Robert Dean），〔西德與東德間質疑〕（New York: Praeger, 1974），第七十四頁；轉引費希爾·迦拉蒂（S. Fisher-Galati）編，〔東歐共產黨〕（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9），第一十六頁。

次於蘇聯。由於一般生活水平提高，加上政治再教育，東德人民逐漸接納東德共黨政權，但尚未達到完全支持的程度。

在國際上，東德共黨政權漸獲共黨集團以外很多國家的承認，一個德國兩個政府的理論逐漸為人所接受。東德共黨統一德國的觀念也經歷了蛻化的過程。「社會主義統一黨」第七次代表大會（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方面宣佈，東德建設已發達，社會主義社會的任務業已實現；另一方面，承認在德國領土上已形成的兩個社會體制不同的主權國家（東德與西德），並強調兩個德國應在「平權、國際法公認的準則及和平共存原則」的基礎上調整相互關係^①。

東德共黨第八次代表大會（一九七一年六月）所通過的下一個五年計劃，再一次強調提高人民生活的物質與文化水平的任務。大會所確定的對西德方針是，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內劃清界線，在前述的基礎上關係正常化。一九七二年底，東西德簽訂了關係基礎條約。

一九七六年五月，東德共黨召開第九次代表大會，批准一九七六至一九八〇年國民經濟發展計劃，通過新黨綱及新黨章。新黨綱確定了共黨在東德已發達社會主義社會中進一步建設的任務，以及逐漸過渡到為共產主義創造先決條件的任務。洪立克（Erich Honecker）當選總書記，烏布立希特時代落幕。

在共產世界中，東德共黨始終向蘇聯共黨認同，成為蘇聯最密切的伙伴。因此，東德共黨與中共關係不和，並認為毛思想完全違反馬列主義。

組織結構與高層領導

東德社會主義統一黨在組織結構上完全追隨蘇聯共產黨，其指導概念是列寧主義原則：「民主集中制」。實際上，集中多於民主。按照黨章，黨代表大會是最權力機關，每五年舉行一次；大會休會期間，由中央委員代行其職權，負責執行大會決議。第十次大會選出中央委員人數約一百五十六名，候補委員約五十七名。中央委員會每年約集會四次；平時組織各類委員會。黨代表大會與中央委員會皆非決策與政策形成的審議機構。最高權力在政治局。

政治局委員由中央委員相互選出。上一屆共選出委員十九人，候補九人。這（第十）屆中央委員會選出政治局委員十七人^②，他們是：洪立克（Erich Honecker），總書記及國家會議主席；亞克森（Hermann Axen），中央書記，主管國際聯絡；霍夫曼（Heiz Hoffmann），國防部長；道魯斯（Horst Dohlus），中央書記，主管黨組織；辛德曼（Horst Sindermann），

註^①

同註^①。

註^②

〔真理報〕（蘇），一九八一年四月十七日。

人民會議主席；克勞里科夫斯基（Werner Krolikovski），韶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密爾凱（Erich Mielke），國家安全部長；密托克（Günther Mittag），中央書記，主管經濟；繆肯拜克（Erich Mückenberger），黨中央檢查委員會主席；勞門（Korrad Nauman），柏林區第一書記；拿依曼（Alfred Neuman），韶長會議第一副主席；狄希（Harry Tisch），自由德國工會聯盟主席；費爾那（Paul Verner），中央書記，主管安全；弗爾弗（Werner Walde），舍勒區第一書記；哈格爾（Kurt Hager），中央書記主管文化與科學，亦是東德共黨首席理論家；史托夫（Willi Stoph），部長會議主席；赫爾曼（Joachim Hermann），中央書記。八名政治局候補委員是：華爾德（Werner Walde），波茨坦區第一書記；克萊布（Günter Kleiber），機械及運輸製造部部長；克倫茨（Egon Krenz），「自由德國青年」第一書記；藍格（Ingeburgy Lange），中央書記，主管婦女工作；彌勒（Margarete Müller），國家會議成員；徐瑞爾（Gerhard Schürer），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雅諾文斯基（Werner Jarowinski），中央書記，主管貿易與分配；夏鮑夫斯基（H. Schabowski），東德共黨機關報「新德意志」主編。

十多年以來，東德共黨政治局極少更動，以這次代表大會後所產生的最高領導為例，原有十九名政治局委員除四名亡故外，餘皆連任，新進兩名政治局委員（道魯斯與赫爾曼）則由原有候補政治局委員晉升，合計十七名。原有九名候補，除二名晉升外，餘七名全部連任，再加新進一名（夏鮑夫斯基），共有八名。據分析，政治局內可略分為三派^⑩。一派由保守但富有彈性的黨政工作人員組成，主張與蘇聯保持良好關係，以洪立克為首；另一派由較年輕的專家組成，以史托夫為首；第三派則由比較年老的正統黨員組成，傾向教條主義，以彌勒、拿依曼及彌肯拜克等為主要分子。一般認為，史托夫為洪立克的主要權力競爭對手。

黨的執行機構是書記處，第十屆代表大會後共產生一名總書記，由洪立克連任，另外書記九名，亦皆連任（見前列政治局成員名單）。書記處之下設立工作部門，約分兩類，一類主管黨務，另一類則督導政府各部會的工作。總書記是書記處與政治局的主席，是東德政治體系中最有權力的人。

東德中央政府之下分設十五個行政區（Bezirk）及東柏林市，各設區級黨組織，由區第一書記領導。按慣例，區第一書記也是中央委員，甚至可成為政治局委員。區下設縣（Kreis），東德約有兩百個縣，各設縣級黨組織，由縣第一書記領導；大工廠、大學及若干大型企業等團體亦比照縣級成立黨組織。基層組織是東德共黨的最小單位，通常在工作地點，如工廠、辦公室、學校或住宅區內組成，平均人數約為二十七人。至一九八一年四月中旬，東德共黨共有七萬九千六百六十八個基層組織，黨員總數（包括候補黨員）為二百十七萬一千一百一十人，比五年前，增加三十五萬一千九百五十三人^⑪。

註^⑩ 費希爾·班拉蒂，〔東歐共產黨〕，第一七九頁。

註^⑪ 「洪立克的報告」，〔真理報〕，一九八一年四月十一日。

在目前東德共產黨員中，工人佔百分之五七·七，是東德共黨成立以來的最高紀錄；知識分子佔百分之二十一·一，婦女佔三分之一^⑩。東德現有人口一千七百餘萬人。

東德共黨主要的外圍組織一是「自由德國青年」(FDJ)，一是「自由德國工會聯盟」(FDGB)，前者成員超過二百三十萬，後者超過八百八十萬。兩者在國內的主要任務是推行政治教育，訓練成員；後者對國外「革命」組織及運動提供意識形態與物質支援。

共黨統治下的東德經濟

同很多工業國家比較，東德算是小國寡民，對進口的原料與燃料的依賴性相當高。東德共黨統治下的經濟重點是，原料加工，製造高品質產品外銷。東德是共產集團經濟互助委員會的基本成員，是蘇聯最重要的貿易對手^⑪。就整個情況而言，東德經濟的發展也較其他共產國家穩定，成爲共產集團中的「奇蹟」^⑫；也有人稱之爲「東歐的優等生」、「赤色的奇蹟」或「豐富的社會主義」^⑬。這點成就並非倖致，乃是長期審慎的政策、不求急功與嚴格的經濟紀律的結果^⑭；大規模工業生產企業實行「聯合企業」(Kombinats) 也是經濟發展有成效的基本原因之一。

一九八〇年東德經濟發展的實績爲：國民所得增加百分之四·八，工業生產百分之四·七，勞動生產力百分之四·七^⑮，農業生產的成長超過計劃，穀物收成較前一年增加百分之八·九^⑯。東德共黨總書記在第十次代表大會上總結過去五年的經濟發展時特別指出，一九八〇年與一九七五年比較，國民所得增加百分之二十五·四，工業生產百分之三十二·一。工業在國民所得中的比率增高，一九八〇年達百分之六十一·九；在出口產品中，工業產品總值佔百分之九十三。近十年來，農業生產也大有進步^⑰，

註^⑪
同註^⑫。

例如，一九八〇年東德與蘇聯的貿易總額爲九十二億盧布，爲蘇聯對各國貿易中數額最多的一國。見「蘇聯對外貿易」(月刊)，一九八一年三月，附冊。
註^⑯
〔波蘭、東德經濟觀察季刊〕(E.I.U.)，一九八一年第一季，第十五頁。

註^⑰
「保守的教條主義者——東德共黨總書記洪立克」，〔世界週報〕(日本)，一九八一年五月十一日，第三十九頁。
註^⑱
同註^⑯。
註^⑲
同註^⑯。

註^⑳
密托克，「對政治局的報告」，原載〔新德意志報〕(Neues Deutschland)，轉引，PBIS, East Europe, Dec. 12, 1980, E13.

註^㉑
註^㉒
註^㉓
註^㉔
註^㉕
註^㉖
註^㉗
註^㉘
註^㉙
註^㉚

因此有人把東德稱之爲「經互會」國家中的丹麥^①。

按照東德共黨第十次代表大會所通過的五年（一九八一—一九八五年）計劃規定，一九八五年與一九八〇年比較，國民所得應增加百分之二十八至三十，工業生產百分之二十八至三十，工業勞動生產力百分之二十八至三十；農業方面，與一九七六至一九八〇年平均數值比較，至一九八五年時應增加百分之六·九至八·一；國民住宅在五年內增建百分之十八至二十；對外貿易增加百分之三十；人民實際所得增加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二^②。

與經互會集團內其他國家比較，東德共黨對未來五年所定的經濟成長目標，顯然偏高。這些目標能否完成，殊難預料，因爲在東德經濟中也有不少難題。首先是勞工缺乏問題。目前，西歐各國正面臨失業問題，而東德正好相反，勞工不够，基本原因之一是一九四九年以來約有三百多萬人逃往西方，其中絕大部份是正當生產年齡的勞動人口。爲補償這一缺點，東德婦女大批加入生產，目前在工作年齡的婦女中，百分之八十五已加入勞動。婦女在勞工總數中，將近一半。

東德共黨政權面臨的另一個經濟問題是通貨膨脹壓力。東德必須進口大量原料、機器及零件，後者大部份從西方國家進口，因此西歐猖獗的通貨膨脹不可能不影響東德經濟。東德共黨政權曾向人民承諾，維持穩定的物價；同時東德共黨對波蘭政府因物價上漲所引起的風潮也熟記在心。因此，東德把若干基本必需品的價格壓低，但容許新產品漲價。低物價品必須貼補，遂致其他部門祇得調整產品以求補償。東德大力推行增加生產力的運動也是補償的方式之一。

此外，在促進生產方面也存在著另一些限制因素，諸如計劃效能不高，運輸不暢，組織不完善，設備老化等。這些因素如不能有效消除，勢將影響生產能量，阻礙經濟發展。

能源是東德經濟中有待克服的另一個問題。未來幾年中，東德每年可從蘇聯得到一千九百萬噸原油，但不敷東德能源與石油化學原料所需。能源供求之間的差額到一九八五年才能拉近，屆時核子能源可提供所需能源的百分之十二—十四^③。

在經濟上，東德擁有其他東歐國家所沒有的便利。它可透過西德打進歐洲共同市場，使東德輸往共同市場的貨品不必繳納關稅；按規定，非共同市場國家的貨物進入共同市場皆應納稅。但是，這項便利能否協助東德克服其結構上的問題，令人懷疑。在共黨體系中，政治指導經濟，使經濟難以發揮潛力。

註^① 同註^④。

註^② 〔真理報〕，一九八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波蘭、東德經濟觀察季刊〕（E.I.U.），一九八一年第一季，第十七頁。

八十年代的十個主要方向

東德共黨總書記曾在第十次代表大會上，就東德八十年代的經濟戰略提出十個主要方向，其要點如下^{②3}：

一、採取新措施，使「社會主義優越性」與科技革命成果相結合。東德共黨認為，科技革命已成為促使經濟力成長、提高國民經濟效率的基本潛力，與蘇聯及經互會其他國家的國民經濟多邊聯繫可為提高生產力創造有利條件。

二、東德八十年代經濟戰略的目的在於明顯提高生產力。在最重要的部門內將採取合理化措施，減省勞動力，使其參與其他經濟活動。

三、提高原料與燃料資源及國民經濟基本資金的使用效率。

四、提高產品品質，為了生產高品質的新產品將利用最進步的科學與技術成就。

五、採用科技成就，大幅提高勞動效率。

六、注重社會主義合理化，也就是在高度科學水平上使現有技術現代化、更新生產過程，以創造最有利的勞動條件。在八十年代中，合理化將與自動化越來越密切地相互配合。

七、東德經濟新戰略將確定投資政策的比例，使其成為科技進步的推動力。因此，在八十年代中，東德將把資金集中於下列各範圍：社會主義合理化，進步技術之採用，工作時間及物資消耗之降低，經濟各部門效率的提高。

八、增加大眾所需商品，改善品質。這些商品的生產必須利用本國原料，或從「社會主義」國家進口的原料。

九、社會生產高度成長必須與國民所得成長相互配合。

十、在東德共黨的經濟戰略中，基本出發點是，要求擴大再生產。東德共黨首領認為，已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尤其是它的物質技術基礎與密集的經濟活動是密不可分的。

儘管東德共黨領導在第十次代表大會上，很少直接批評或提出現行經濟體系運作的缺點與錯誤，不過顯而易見，在前述的十個主要方向中，不少是為了針對時弊而提出的。例如，在十點中，數度提出合理化要求，可見在東德經濟體系中，在生產過程與管理中以及在資源與勞動力分配等方面，存在著不合理的現象與事實。

共黨統治下的東德政治與社會

洪立克在總結報告中，也沒有提到內部政治問題。這並不表示沒有政治問題，祇是潛而未發，不需要特別注意。目前，共黨控制東德全國每一個層面，按其實踐與一切評價準則，東德統一社會主義黨是一個原型的、革命後的共產黨⁽²⁾，其顯著特點是對政府與經濟作較合理的管理，普遍官僚化，對異議分子極度不容忍。黨控制一切大眾傳播工具，嚴密監視宗教活動及全國文化生活，不遺餘力「建設社會主義」。

大部份東德人民不相信社會主義，祇是順從共黨統治而已；他們對共黨不一定懷有敵意，但是表示得漠不關心。祇有青年之中，有一些誠信者。在東德社會裏，國家觀念在慢慢形成中，人民也因其成就而自豪。不過，很多人覺得，一些巨大成就與共產主義無關，也不是因共產主義而獲致的。東德人所感到自豪的包括高度的社會品質與社會變動，較高的物質福祉。與其他共產國家相比，東德居民有較高的生活水平。事實上，東德共黨為追求自己政權的合法性，不得不依靠經濟上的成就。在東歐，別的國家可利用民族主義感情，或稍稍放鬆控制以爭取人民的支持。這些手段東德皆用不上，因此東德共黨祇好竭力改善人民的物質生活以鞏固其地位⁽³⁾。此外，在若干公共活動中，東德共黨也讓人民作有限的參與，但成就不大⁽⁴⁾。

東德共黨總書記洪立克於一九七一年初掌握實權時，開始實施一個社會綱領，力圖改善人民生活條件。這一綱領的實現有賴經濟的發展。十年後，洪立克在這方面已有相當程度的成就。一般人民已無明顯的不滿。不過，在知識分子中則不然，例如一九七六年有「卑爾曼事件」⁽⁵⁾，一九七七年有「德國民主共產黨人聯盟宣言」事件。

卑爾曼事件說明了東德共黨內部的政治問題。卑爾曼（Wolf Biermann）是由西德移居東德的共產黨員，他的詩歌享譽東西德，尤獲青年敬仰。但是，當他批評共黨教條及官僚體制時，遭到東德共黨的處罰，被禁公開露面。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卑爾曼獲准赴西德舉行音樂會；東德當局乘機取消他的公民權，不許他返回東德。此事引起東德文藝界人士的反響，發表聲明為卑爾曼辯護。凡是支持卑爾曼的人皆受到極大的政治壓力，後來其中若干已自動與此事件疏遠，有些人則移民出國。共黨方面認為，

註⁽²⁾ 李文斯敦（R. Livingston），「莫斯科與波昂之間的東德」，《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一九七一年元月），第三〇卷三〇一頁。
註⁽³⁾ 賽鮑姆（Karl Birnbaum），《東西德》（Lexington, Mass. : D. C. Heath, 1973），第五十四頁；轉引希爾·巴拉蒂，〔東歐共黨〕，第一九一頁。

註⁽⁴⁾ 皮里斯（Thomas A. Baylis），「探求公法性」，〔共產主義問題〕（一九七一，一一四月），第四六一五五頁。
註⁽⁵⁾ 韓哈德（Arthur M. Hanhardt, Jr.），「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當代歷史〕（一九七八年四月），第一七三頁。

卑爾曼與帝國主義勾結，企圖離間東德與蘇聯；但是，卑爾曼及其他知識分子則認為，他們對黨與政府的批評並非反共，而是自我批評，其目的在保持與發展東德社會主義的政治活力。儘管雙方論戰，但是一般民眾對這種爭辯不感興趣，也未捲入，他們所感興趣的是生活水平的提高。

德國民主共產黨人聯盟（BDKD）宣言事件發生於一九七七與一九七八年間。這個宣言登載於西德「明鏡」（*Der Spiegel*）週刊，分兩期載完²⁸。據說，這份宣言出自東德共黨中級與高級幹部的手筆。他們批評洪立克的領導，主張建立聯合的與不可分割的德國共和國，批評東德與蘇聯的關係，贊同歐共主義，要求取消新聞出版檢查制度。東德共黨當局對「明鏡」發表此一「宣言」，極為憤怒，並且指控，這是西德情報機構所捏造的文件²⁹。「明鏡」週刊在東柏林的辦事處於元月十日接到東德外交部的通知，辦事處立即關閉，人員離境³⁰。

姑不論「宣言」的真實性如何，它的內容恰好包涵了東德異議分子的觀點。因此，總的說來，東德國內政治基層（人民大眾、人民組織、各黨派）似乎平靜，但隱伏著不滿分子。這一點對未來政治發展的影響，不可低估，波蘭是一個例證。

洪立克在總結報告中於談到「民主共產黨人」等異議分子時指出，至今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意識型態之間，沒有第三種意識型態，「忠於馬列主義就是忠於真理」。他說，儘管有人說馬克斯、恩格斯及列寧的思想「已不合時」、「已老化」、「已死亡」，但是他們的思想「仍舊是現時代最強有力的精神力量」，而資本主義意識型態已反映出「資本主義體系的深刻危機」³¹。

在對外政策上，東德緊追蘇聯。洪立克在總結報告中，對波蘭問題清楚地表達了自己的立場。他說，波蘭正面臨困難，東德決定與「波蘭共黨」團結一致，以維護與強化波蘭的社會主義。洪立克在其他場合會說，共黨國家「最高行動法則乃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也就是一九六八年在捷克、一九七九年在阿富汗曾經引用過的布里茲涅夫主義。東德共黨特地譴責中共與美國勾結反對蘇聯，以及對社會主義大家庭的敵視態度。近年來，中共在非洲與蘇聯一爭長短，而東德亦已投入與蘇聯並肩合作。

近年來，東德與亞、非、拉丁美洲加強友好關係，洪立克在第十次代表大會上再度強調此一意向。他說過，東德曾為這些國家訓練技術工人、技士、教師等。從一九七六年至今，其人數約為八千五百人³²。不用說，友好關係意味著政治影響力與經濟「合作」。

²⁸ 〔明鏡〕，一九七八年元月二日，第二一一四頁；一九七八年元月九日，第二六一三〇頁。

²⁹ 「東德新聞社東柏林國際電訊」，*FBI S, East Europe*, Jan. 1, 1978, E8.

³⁰ 同註²⁹, Jan. 10, 1978, E12.

³¹ 〔真理報〕，一九八一年四月十二日。

³² *E.I.U.*, 一九八一年第一季，第十五頁。

東德共黨領導雖然行禮如儀地譴責西方的帝國主義和西德的復仇主義，但是洪立克強調，東德仍然嚴格執行緩和政策。事實上，東德為了發展經濟，正大力擴展對外貿易，因此對外關係必須富有相當彈性。

結論

東德共黨與東德政府皆是蘇聯一手造成的，因此在先天上，蘇聯與東德的關係就比較特殊。東德能從風雨飄搖中渡過難關，走上穩定，成為國際社會公認的一員，完全憑依蘇聯軍事、政治、經濟、外交等多方向的支持。因此，東德成為蘇聯集團中最堅強可靠的一個環節，是可以理解的。

東德共黨領導階層中，主張親蘇的成員固然不少，但主張疏遠蘇聯者並非全無。目前，這個領導班子年齡也不算輕，權力轉移並非遙遠之事。無論如何，東德與蘇聯緊密關係不可能長久不變。

目前東德人民順從共黨政權，並非對社會主義的忠誠，而是一時滿足於物質條件。他們心中明白，經濟的成就不是由於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而是由於其他原因。人們都知道，德國原是一個有工業基礎的國家，經濟復興本非難事，西德與日本都是明顯的例子，而東德的成就與西德及日本比較仍相距甚遠。其次，東德與西德建交後，東德佔有多項對外貿易的便利，而對外貿易在東德經濟中佔有相當地位。這也是造成東德七十年代經濟「奇蹟」的原因之一。

一般民衆滿於經濟成就，對現行共黨政府不作苛求。但是，知識分子則不然，他們不但要求經濟發展，也盼望政治現代化，因此不可能滿足於共黨的統治，這種不滿情緒與政治見解尚未贏得人民大眾的響應，故暫時不能發生作用。如果東德經濟一旦衰退，人民經濟慾望不能獲得滿足，勢將產生經濟的不滿。經濟的不滿將轉化成政治的不滿。一旦人民大眾的不滿與知識分子的不滿相結合，則較大的騷動便極易發生，波蘭罷工風潮演變的過程就是如此。

東德共黨在其第十次代表大會上通過下一個五年計劃，確定了八十年代經濟發展的十大方向。這個計劃與十大方向的成敗與東德共黨的未來命運，息息相關。